

想像

张爱玲

关于张爱玲的
阅读研究

想像张爱玲
关于张爱玲的
阅读研究



XIANGXIANG
ZHANGAILING
GUANYU
ZHANGAILING
DE
YUEDU
YANJIU

刘锋杰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想像张爱玲:关于张爱玲的阅读研究/刘锋杰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6

ISBN 7-5336-3777-1

I. 想... II. 刘... III. 张爱玲(1920~1995)—
文学研究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3214 号

责任编辑:万直纯

装帧设计:袁 泉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图书印装分公司

开 本:880×1230

印 张:16.25

字 数:320 000

版 次:2004年6月第1版 200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2 000

定 价:32.0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651321

邮 编:230061

想
像

张关
爱爱
玲玲
的的
阅读
研研
究究

序

①

序
言

〇
〇
一

夏中义

作为小说家的张爱玲，其生命力，要比作为女人的张爱玲健旺。作为女人，张爱玲已香消玉殒，“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然而作为小说家，张爱玲依然风姿绰约地活在一代代读者的想像世界。这倒应验了一句俗语：有的人活着，却死了；有的人死了，却活着。张爱玲属于后者。

由此可引出一条“规则”，用来检验作家的优秀与否，这就是：看他（她）笔下的那叠文稿一俟成书，是否真有人读，读得爱不释手，甚至像祖上宝物似的传世，让历代读者动心、动情。何谓名著？一部作品，若它在民族乃至世界文学传播史上所享有的时间长度，明显超出了作者的生年长度，也就离“名著”不远了。

一部名著或一代名家的文学生命史，其实，也就是它持久地经受住历代读者的审阅暨历代论者的评判的历史。于是，也

就有了本书的阅读故事：即为了张爱玲小说这“一个”对象，半个多世纪来，海内外竟不乏著名文人、才子与学者，从傅雷、胡兰成、夏志清、唐文标、柯灵，到陈思和、孟悦，先后七子，接踵追逐，舞文弄墨，歧见迭出，各表心曲。诚然，若着意于学术公正，这份旨在“想像张爱玲”的名人录，还应添上——刘锋杰。

锋杰“金榜题名”，居第八，这是很累的位置。这就像小组会专题发言，切忌挨到末尾，因为容易脱口的词，出彩的话，往往被人家悉数道尽，轮到你开口，恐很难别出心裁，倘不鸚鵡学舌的话。更无须说锋杰此书实为“张爱玲研究小史稿”，是对已在“张学”一案留下痕迹的诸家研究之研究，这就更把自己置于“进退两难”之境：若不下苦功“照着说”，不踏踏实实地将先哲时贤的见解、门径、思路一一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足以在整体上给对象以逻辑还原，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就无权对“张学”诸家说三道四；进而，你若仅仅“照着说”，而无力“接着说”，不能雄辩地说出诸家不曾说过，或虽曾涉及却浅尝辄止、有待深化的创意，则“张学”史也就无需你再多嘴，因为没有信息量的文字近乎聒噪，不说反倒清静。这对锋杰来说，与其说是智商的挑战，毋宁说是学风的砥砺——因为在当下本土学界，为了留下数千字的书评，而愿将十几万言的原著啃几遍的书呆子，已属珍稀。

这就不禁让笔者想起熊十力，熊十力生前是颇讲究朴学文风的。所谓朴学，重在实证。熊先生曾言“根柢无易其固，而裁断必出于己”，这诚然是后学应铭刻在心的。然细读这对短句，彼此间似不无微妙有待揭示——“裁断必出于己”固然属独立思考，是“接着说”，但你“接着说”可靠与否，又是有前提的，将取决于“根柢无易其固”，即取决于你能否看清研究对象的本

相,原汁原味地“照着说”。“根柢无易其固”属事实判断,它回答“对象是什么”;“裁断必出于己”属价值判断,它显示“你怎么看”。将“根柢无易其固”置于“裁断必出于己”之前,是合乎科学实证规则的,这是让“实事”来制衡“求是”,而不是倒过来,又沦于“意图伦理”思维,让主观意念来曲解客体存在。故熊十力又说治学须“踏实”与“凌空”相济:所谓踏实,乃“必将论主之经验与思路,在自家脑盖演过一番,始能一一得其实解。若只随文生解,不曾切实理合其来历,是则浮泛不实,为学大忌”;所谓凌空,乃“掷下书无佛说,无世间种种说,亦无己意可说,其唯于一切相,都无取著,脱尔神解,机应自然,心无所得,而真理昭然现前”。

不难确认熊氏学风与乾嘉学派之间有传承,我是把乾嘉学派所恪守的朴学文风,奉为现代学统赖以孕育的重大因素的。我欣喜地发现,锋杰此书,实是以其学术行为来认同此理念的。末了,我还想说,此书在锋杰全部著述中所以颇显突出,以致我屡屡联想起锋杰所酷爱的徽州砖刻:既有汉赋式的气势重拙,满幅铺陈,几乎不留空白;同时又不乏宋画式的细部真实,纤柔笔触,气韵精微——这是与锋杰文风有关的:当他“照着说”时,他是豪放的写实派,凛凛然,似承汉赋之风;当他“接着说”时,他又转为婉约地写意,幽幽然,似用宋画之笔。

2003年深秋于沪上天忧草庵

001	序言	夏中义	
001	第壹章	创作个性与文学转型的误读	——读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
035	第贰章	毕竟是『半个』知音	——读胡兰成《评张爱玲》
115	第叁章	创立张学的阐释模式	——读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张爱玲》
207	第肆章	无光的地方有没有生命？	——读唐文标《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279	第伍章	意识形态的迷雾	——读柯灵《遥寄张爱玲》
337	第陆章	民间概念也是遮蔽	——读陈思和《民间和现代都市文化——兼论张爱玲现象》
411	第柒章	何谓张爱玲的现代性？	——读孟悦《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
479	附录	拆解『倾城』的神话	——张爱玲《倾城之恋》创作意图辨
499	主要参考书目		
503	后记		

想
像

张
爱
玲

关
于

的
研
究



第壹章

创作个性与文学转型
的误读

读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

我不责备作者的题材只限于男女问题。但除了男女之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人类的情欲不仅仅限于一二种。假如作者的视线改换一下角度的话，也许会摆脱那种淡漠的贫血的感伤情调；或者痛快地成为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把人生剥出一个血淋淋的面目来。我不是鼓励悲观。但心灵的窗子不会嫌开得太多，因为可以免除单调与闭塞。

傅 雷

1

在张爱玲接受史上，傅雷 1944 年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具有重要意义。与同期的张爱玲解读相比，^①傅文已是真正的长篇巨制，并从一种特定的批评视角来解读张爱玲，使傅文既有自身的逻辑构架，也使它对张爱玲的解读具有了有机整

^① 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在 1944 年第 5 期《万象》发表以前，新中国报社曾于 1944 年 3 月 16 日举办“女作家座谈会”，张爱玲参加了，与会者发表了有关张爱玲的零星言论。另，胡兰成发表的《评张爱玲》，略早于傅雷的文章，也为长文，但毕竟感悟多于具体分析，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

体性。有关文学创作的基本问题如内容、技巧、风格、语言等，一同受到了重视。傅雷凭借他的丰厚学养与艺术敏感，在此次解读活动中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对后来的张爱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傅雷称《金锁记》“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①这里用“至少”相评，暗示傅雷对《金锁记》的实际评价可能更高。十几年后，夏志清称《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②评价之高已超过傅评，但二者之间未必没有承继。而傅雷认为《金锁记》“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③虽为点评，但也启发后人将这两个杰作加以比较研究，以探讨现代文学的发展变化及鲁迅与张爱玲的各自艺术个性，这将极具冲击力地改写现代文学史。傅雷对张爱玲高超技巧的推崇，更为后人开启了一个最有活力的话题。有关心理分析与意象创造的两点结论，业已成为后人论张时必须援引的批评资源之一。傅雷评张形成了两个层面：定论层面，成为后人论张的切实起点；未定论层面，成为后人论张的想像起点。如果说，接受史的开始要以重要的解读为标志的话，不论是功傅还是罪傅，傅评确是张爱玲接受史上最早一批有影响的解

①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傅雷文集·文学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本章中傅雷评张语，未注出处，均见此文。

②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406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

③ 我认同“猎人日记”应为“狂人日记”之误印的说法。当时论张，将其与鲁迅相联系，已有胡兰成。只因后来的流行意识形态排斥一切，才在过分纯洁化的过程中压抑了张爱玲与鲁迅关系这类话语。邵迎建认为“猎人日记”非“狂人日记”（《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201页）。我不取此说。

读之一，即使这一接受的开启可能充满着由误读构成的批评陷阱，后来的张爱玲研究仍然不从这里出发。

四十年后，当年发表傅文的柯灵还对傅评全力推崇：“这是老一代作家关心张爱玲明白无误的证据。他高度评价她艺术技巧的成就，肯定《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同时还对《连环套》提出严格的指责。一褒一贬，从两个不同的站头出发，目标是同一终点——热情期待更大的成就。”^①而柯灵本人，则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坛上，成为率先重评张爱玲的少数批评家之一，并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与传播了傅评的基本意蕴。

令人困惑的是，张爱玲没有敬领傅评的深情厚谊。事实上，她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完全否定了傅雷的看法，甚至也没有接受傅评的褒扬。从她1944年8月之后发表的《写什么》、《〈传奇〉再版序》、《自己的文章》里，都可以找到对于傅评的辩驳，同时，她将自己的文学观和盘托出，好像是在接受第三者的评判似的。据陈子善的研究，胡兰成曾在《新东方》第9卷第3期（1944年3月）上发表《皂隶·清客与来者》一文，在文中他评价了张爱玲的短篇《封锁》，称赞这篇小说“非常洗练”，“简直是写的一篇诗”。但胡兰成同时“也为它的太精致而顾虑，以为，倘若写更巨幅的作品，像时代的纪念碑式的工程那样，或者还需要加上笨重的钢骨与粗糙的水泥”。因此，张爱

^① 柯灵：《遥寄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

玲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出：“一般所说的‘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陈子善认为这主要是针对胡兰成的，有道理。但所谓创作“时代的纪念碑”的作品这样的提法，是左翼文坛的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因此，张爱玲的这个答复仍然是较为广泛的。傅雷在评张时虽然没有像胡兰成那样提出“时代的纪念碑”这样的要求，但这并不能表明傅雷对这一观点不是肯定的。他在评价张爱玲时就强调过题材不应限于男女，世界是辽阔的，强调写出人生的血淋淋的面目，并且以巴尔扎克为例来教导张爱玲，这些与要求写出“时代的纪念碑”这样的作品，是一致的。因此，张爱玲的作答，直接反驳的也许是胡兰成的观点，却间接反驳了傅雷等其他人的思想观点。可惜的是，对张、傅之争而言，称职的评判者一直付之阙如。按照柯灵的解释，张爱玲的过于强烈的自我辩护，是在很不礼貌地护短。“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其实，柯灵的此评有点语焉不详，并没有实证性地具体评价张、傅之间到底在哪些观点上相左，为何在这场冲突中傅评必然正确而张辩必然错误。柯灵所举例证仅为张爱玲晚年对某个作品的自我批评与傅评相一致，这是难以证明张爱玲已全部接受傅评的。作家到晚年否定少作，相当普遍，这是作家艺术上精益求精的结果，未必证明这部作品真的不可取；此外，即使这种否定可以成立，一、二部作品的自我反省，并非意味着就要彻底否定自己的艺术追求。在我看来，一定会有更为重要的原因导致张爱玲不能接受傅评，而这个重要原因就是张爱玲若真的接受傅评就意味着她

的创作个性的消失。这是有关她自己的文学活动生死存亡之大事，她不能不辩。因此，张爱玲的自辩，其实是她决心沿着自己的艺术道路走下去的一次宣誓。柯灵如此简单地评述这次论争，实际上已将一场极具含义的思想对话，变成了一场个人恩怨之间的意气用事，这是未能真正理解张爱玲而造成的。如果说，傅评本身就是对张爱玲的一种误读，那么，柯灵对傅雷的回护，则在误读的路上走得更远，把一次不自觉的误读变成一种自觉的误读，并试图将这种误读经典化，这对解读造成了更重一重的遮蔽。故我以为，细致地解剖张、傅之争，不仅可以还张、傅以本色，更加清晰地认识张爱玲的文学价值；同时，也能由此观照与认识 20 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某些顽症，帮助我们反思并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概括而言，我以为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是由古典悲剧理念与绝对主义思想结合而成的一个批评文本，而张爱玲则因充分显示了她的世俗化倾向与个性主义精神，从而造成了她与傅雷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正是这一鸿沟，使得傅评成为典型的隔靴搔痒之作，颇多偏见，而张辩则以自身的事实与创作自由作出发点，成为出色表达自己观念的诗学文本。

先谈傅雷。

至 20 世纪 40 年代,傅雷通过翻译罗曼·罗兰所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与《贝多芬传》、《弥盖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奠定了他的人生观与文学观的价值基础。在写于 1942 年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译者弁言》中,傅雷通过对主人公的热烈赞扬,表达了他心目中的人生理想与文学理想,那就是:“尼采底查拉图斯脱拉现在已经具体成形,在人间降生了。他带来了鲜血淋漓的现实。托尔斯泰底福音主义的使徒只成为一个时代底幻影,烟雾似的消灭了,比‘超人’更富于人间性、世界性、永久性的新英雄约翰·克利斯朵夫,应当是人类以更大的苦难、更深的磨炼去追求的典型。”^①在写于同年的《贝多芬传》的《译者序》中,他又表明了对于贝多芬的仰慕:“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这是我十五年来与日俱增的信念。而这一切都由贝多芬的启

^① 傅雷:《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译者弁言》,《傅雷译文集》第十一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

示。”^①而傅雷翻译巴尔扎克，必然也有内在精神的呼应作动力。在写于1954年有关《夏倍上校》的一则内容介绍中，傅雷对巴尔扎克的思想与艺术特点的概括，正与此前他所要求于张爱玲的完全一致。傅雷说：“每个中篇如巴尔扎克所有的作品一样，都有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的强烈的对比。”^②由此看来，傅雷形成了一种英雄主义的人生观与艺术观。就创作而言，他看重作者的社会使命感，崇高的道德自觉，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与追求精神，推崇大气磅礴的、具有史诗特征的文学作品。即使就艺术技巧而言，傅雷所喜爱的也是那种强烈的对比、鲜明的刻画、深刻的揭示、无情的抨击。而这一切，正构成了傅雷用以评人衡文的基本框架与评判标准，且傅雷本人又对这种人生观与文学观坚信不二，更形成了他的坚定立场，使他很难有所旁逸而稍显任何松动。

因此，当傅雷带着他的文学理念介入张爱玲的世界时，他感到有所震惊是在所难免的。一方面，他可能震惊于张爱玲的才能，张爱玲能够将市民日常生活缺乏生气的原生形态带进文学，并给予极其出色的表现，故对张爱玲的艺术才能相当赞赏；另一方面，他也必然难以接受张爱玲的创作追求，在张爱玲的艺术世界中感到极大失落，无法找到人生的英雄从而产生那种

① 傅雷：《贝多芬传》的《译者序》，《傅雷译文集》第十一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 傅雷：《夏倍上校》（介绍），《傅雷译文集》第一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

对于英雄主义的认同感,在深深的共鸣中让其再次体验英雄主义的悲与欢,为生命扯满风帆,疾驰于人生的大海之上。

傅雷的悲剧观已是一种斗争式的悲剧观,即使傅雷在界定斗争这个极有歧义的概念时相当小心,将人的内在“情欲”视作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从而纠正了一般的社会悲剧说忽略人的内心情感冲突的认识偏颇,但也未能根本改变傅雷以斗争为基调构筑悲剧冲突的悲剧认知理念。这样,悲剧性作品不仅成为傅雷推崇的一种文类,它所包含的悲剧意识还被傅雷视作一种普遍的文学精神加以推广,成为评价文学创作的一种绝对标准。而与此相关的内容与形式概念,也因受制于悲剧意识的支配而具有了特定内涵:只有当其充分表达着悲剧意念时,它们才获得各自的完满实现;相反,内容与形式若与悲剧意念相冲突,也就成为被否定的对象了。这样,傅雷的批评空间,也就被悲剧所充塞而不能容忍任何非悲剧的介入。《金锁记》获得傅雷的好评就是因为它的故事具有悲剧性:一个年轻的姑娘嫁给一个残废的男人,经受了爱的煎熬并转而戴上黄金的枷锁,形成变态的心理,这是极富刺激性的题材。尽管这个姑娘出身并不高贵,不像西欧的悲剧人物往往是一个英雄,但其经历的跌宕起伏,可能具有的心理冲突与性格分裂的深度与强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大悲大喜的情节巨变,都是悲剧表现的最好对象。傅雷从悲剧主题的角度分析了《金锁记》的主人公:“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情欲在她心中偏偏来得嚣张。已经把一种情欲压倒,才死心塌地来服侍病人,偏偏那情欲死灰复燃,要